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

寇 寇 史世伟

【内容提要】 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国家，并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新冠疫情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重构冲击，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后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快速提升，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增加值来源地。中国价值链的独立性持续增强，而德国在上游和下游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出于经济安全考量，德国企业尝试分散供应链布局，或将在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其他经济体，但这并未改变两国以互补性为主导的经贸关系，由于核心制造业产业链高度融合，中德经济无法“脱钩”。当前非经济因素干扰经济议题，德国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视中国为“制度性竞争者”，经贸关系作为中德关系“压舱石”作用受到限制，但鉴于两国趋于平衡的经济依赖关系，德国对华政策转向并不会对中德经贸合作的基本面产生根本影响。随着两国相互依赖关系深度和广度的提升，中德共同经济利益网络不断扩大，经贸合作依然是中德关系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 中德经贸关系；全球价值链；出口增加值；国际贸易；中德关系

【作者简介】 寇寇，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讲师；史世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89）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1.06.003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1）06-0049-20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百年大变局下中国与欧盟产业链协同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1CGJ02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科研项目“新冠疫情对中德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视角”（项目批准号：SYL2020ZX011）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长期以来中德经贸关系发展平稳,截至2020年德国连续46年保持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连续五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合作紧密,德国主要生产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处在价值链中游,从德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先进配件进行组装,并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当前国际秩序加速演变给中德经贸关系带来诸多挑战。德国对华疑虑增加,经济问题出现政治化倾向,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对华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制度性竞争者”。2021年6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供应链法》,将经济行为与西方价值观捆绑,要求德国企业必须在人权和环保等方面对其全球直接供应商履行合规义务。新冠疫情暴露了当前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中德复杂产业链分工面临重构。出于经济安全和战略自主的考虑,德国政府2020年8月借由《印太指导方针》鼓励德国企业供应链分散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主要的技术提供方。在中德关系不确定性提高的现实下,通过全球价值链融合深化中德经贸合作,对维护中德关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首先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构建中德价值链分析框架,进而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借助出口增加值数据分析中德两国在价值链的位置和依赖关系变化,最后探讨价值链关系的变化对中德经贸关系以及中德整体关系的影响。

一、分析框架与文献综述

全球化生产、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多与全球价值链结合。不同国家间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动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生产流程纵向融合帮助经济体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全球化生产让企业不需要将资源分散到整条生产链上,而是只专注于价值链上中间产品生产或研发活动等特定环节。^①由于传统贸易统计无法识别增加值来源地,因此需要对贸易产出进行分解,找出增加值的来源国家或地区。罗伯特·库普曼(Robert Koopmann)等人将一国总出口按照国内和国外部分进行分解,分析出口中的不同价值来源。^②根据出口产品的价值来源和最终目的地,总出口可以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被国内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部分。国

① UNIDO,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China,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Vienna: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2018, p. IX.

② Robert Koopman,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9, No. 1, 2012, pp.178-189; Robert Koopman,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No. 2, 2014, pp.459-494.

内增加值依据出口产品的类型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其中最终产品直接面向需求端；中间产品增加值分为两类，第一类中间产品增加值直接被进口国最终需求吸收，第二类被进口国加工后再出口到第三国。国外增加值分为一国出口增加值来自进口国的部分以及出口增加值中来自第三国的增加值（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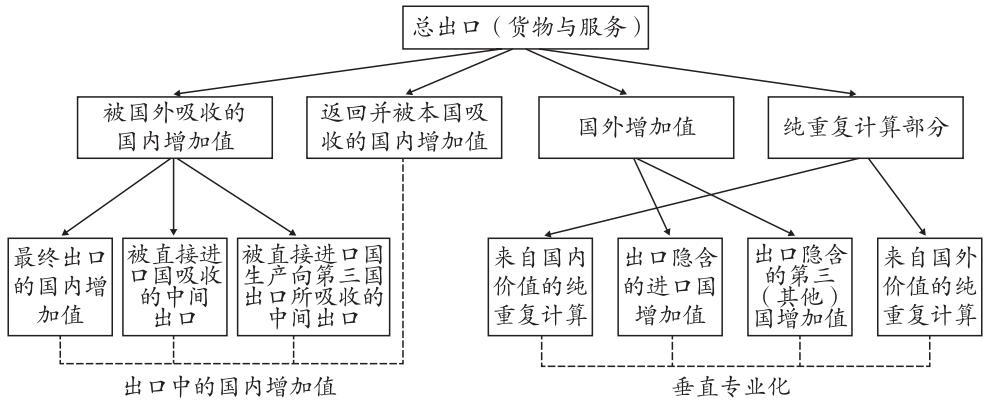


图1 出口增加值分解图

资料来源：David Dollar, Jose Guilherme Reis, 王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6页。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分析中德全球价值链。第一，中德价值链的整体发展趋势。相关研究是国际贸易领域的延伸和深化，研究重点为中国及欧美等核心区域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WTO等机构的报告指出全球已经形成三大全球价值链中心——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①相比中国和美国，德国与全球价值链体系融合得更加紧密，向国外出口的附加值比例更高。^②德国是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贡献最大的成员国之一，德国的优势源于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全球领先的生产能力。^③然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使欧盟向下调整其部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特别是贸易权重较大的制造业，这导致欧盟整

① WTO, IDE-JETRO, OECD, UIBE and World Bank,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Switzerl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9, p.27.

② Lisandra Flach, Rahel Aichele und Martin Braml, “Status quo und Zukunft globaler Lieferketten”（《全球供应链的现状和未来》），Ifo Schnelldienst, No.5, 2020, p.18.

③ 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5—70页。

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下降。^①而中国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在供给端和需求端极大改变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中国从出口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升级为全球核心消费市场和投资目的地，并在全球产业链上跃升为全球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方。^②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水平不断提高，最终产品国外增加值比例降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与中间产品垂直专业化程度增加，出口结构得到优化。^③全球价值链为传统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为深入考察双边经贸关系提供了分析工具。

第二，中德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德国十分依赖国际供应链。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引发的电子产品零部件供应链中断对德国汽车厂商造成巨大冲击，暴露了依赖单一供应商的风险。^④在医疗产业，德国虽然是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净出口国，^⑤但药品的原材料高度依赖中国，如抗生素中80%的原材料来自中国厂商。^⑥根据德国Ifo经济研究所2020年的调查，38%的受访德国经济学家支持把基础服务行业（如医药、医疗设备）的价值链迁回欧洲。^⑦但是区域化的价值链重构将会对德国工业制造业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并深刻改变德国依赖的全球分工。^⑧

① 吕越、毛诗丝：《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其决定因素分析》，《欧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81—103页。

② Holger Görg and Saskia Möslé, “Globale Wertschöpfungsketten in Zeiten von (und nach) Covid-19”（《新冠疫情发生前后的全球价值链》），*Ifo-Schnelldienst*, No.5, 2020, S.3.

③ 高运胜、郑乐凯：《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水平与结构差异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法国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6页。

④ Martina Fuchs, “Risiken weltweiter Wertschöpfungsketten: Maßnahmen und Lernprozesse in deutschen Metallunternehmen nach der Katastrophe in Japan im März 2011”（《全球价值链的风险：2011年3月日本灾难后德国钢铁企业的措施和学习过程》），Universität zu Köl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ographisches Institut, 2011, pp.1-47.

⑤ Martin Braml, Feodora Teti und Rahel Aichele, “Apotheke der Welt oder am Tropf der Weltwirtschaft? Deutschlands Außenhandel auf dem Markt für Arzneien und medizinische Ausrüstungen”（《世界的药店还是依赖世界经济？德国医药和医疗设备市场的外贸》），*Ifo Schnelldienst*, No.5, 2020, p.1.

⑥ Morris Hosseini, “Lieferengpässe bei Medikamenten durch Coronavirus: Krise mit Ansage”（《新冠病毒下的药品供应瓶颈》），September 2020, <https://www.rolandberger.com/de/Point-of-View/Lieferengp%C3%A4sse-bei-Medikamenten-durch-Coronavirus-Krise-mit-Ansage.html>.

⑦ Johannes Blum, Martin Mosler, Niklas Potrafke und Fabian Ruthardt, “Bewertung der wirtschafts politischen Reaktionen auf die Coronakrise”（《应对新冠危机的经济政策的评估》），*Ifo Schnelldienst*, 73. Jahrgang, 4, 2020, pp.48-51.

⑧ Galina Kolev, Thomas Obst, “Die 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internationalen Lieferketten”（《德国经济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IW-Report*, No. 16, 2020, S.19.

第三,中德价值链的相互关系。中国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间位置,德国凭借创新能力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中国的创新密集型行业对德国依赖度较高。^①而现有关于德国对中国依赖度的看法不一。一些观点认为,德国企业已经对中国形成高度依赖,致使德国经济易受中国影响,^②因此德国有必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③另有观点认为,尽管中国是德国主要出口市场,但仅依据贸易额会高估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原因在于从增加值角度看,中德贸易的重要性远小于德国在西欧的贸易。^④也有学者发现,虽然中美德创造的增加值相互交织,但三方之间均不存在价值链的高度依赖关系。^⑤

现有研究文献从整体发展趋势、影响要素和相互关系三个方面对中国与德国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分析,勾勒出中德价值链关系的整体图景。总结现有研究可以发现:

(1)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或区域层面分析全球价值链结构,从中观和微观层面以及专门针对中德价值链关系的研究较少;(2)仅有的几项关于中德经济依赖的研究通常从进出口贸易等单一维度进行分析,忽略了价值链产业关联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因而导致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际贸易分工日益细化,产业内贸易规模扩大,中间产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贸易核算带来的重复统计问题导致以往经贸依赖关系的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已经较为完善,能够较好地刻画产业链上不同生产流程的增加值,为分析中德经贸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本文将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基础,借助出口增加值分解的结构框架,全面分析中国与德国价值链的位置和依赖关系变化及其影响。

① 张其仔、许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升级》,《改革》2020年第6期,第58—70页。

② Handelsblatt,“Das China-Dilemma—Wie die Volksrepublik zur Falle für deutsche Konzerne wird”(《中国困境》),January 2019, <https://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auslandsgeschaeft-das-china-dilemma-wie-die-volksrepublik-zur-falle-fuer-deutsche-konzerne-wird/23874922.html?ticket=ST-8061620-juKu1h199W4NFebXqRaw-ap5>。

③ Spiegel,“Spahn will Europas Abhängigkeit von Arzneien aus China senken”(《施潘要降低对来自中国药品的依赖》),March 2020,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coronavirus-jens-spahn-will-staerkere-eu-produktion-von-arzneiwirkstoffen-pruefen-a-98f0ab3a-4a24-4945-a58e-14bda5f8bdad>。

④ Jürgen Matthes,“Zur Abhängigkei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China im Außenhandel—Eine Faktensammlung”(《德国外贸对中国的依赖》),*IW-Report*, No.43, 2019, pp.1-33。

⑤ Lisandra Flach, Rahel Aichele und Martin Braml,“Status quo und Zukunft globaler Lieferketten”(《全球供应链的现状和未来》),*Ifo Schnelldienst*, No.5, 2020, pp.16-22。

二、中德在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关系

本文使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领域广泛使用的数据库资源。^①由于Eora数据库不包含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最终需求依赖度计算所需数据，因此本文将同时使用OECD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②作为补充。

（一）中德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变化

第一，整体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快速提升。2005年到2018年德国出口增加值从1.2万亿美元提高到2.2万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口增加值来源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则从0.7万亿美元上升到2.16万亿美元，紧随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增加值创造国（见图2）。从占比看，德国的出口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从11.33%小幅下降至10.38%，而中国则快速上升至全球出口增加值的10.17%（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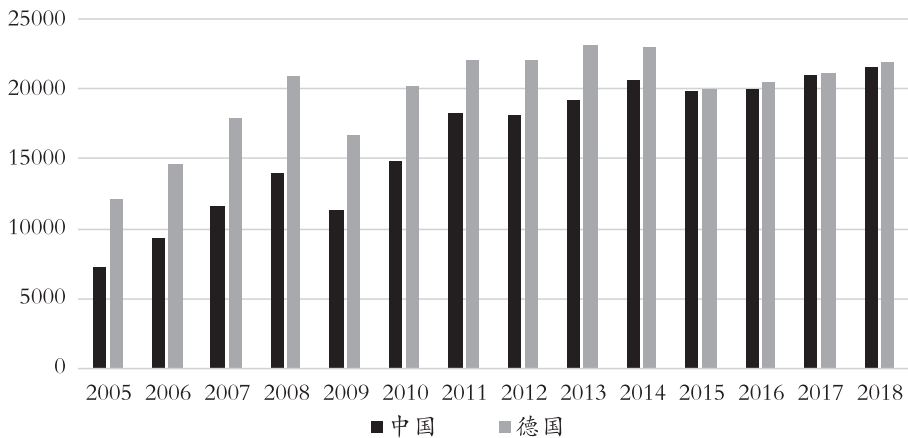


图2 中德两国出口增加值（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① 详见：Bruno Casella, Richard Bolwijn, Daniel Moran and Keiichiro Kanemoto, “Improving the Analysi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UNCTAD-Eora Databa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Vol. 26, No. 3, 2019, pp.115-142; Aqib Aslam, Natalija Novta, and Fabiano Rodrigues-Bastos, “Calculating Trade in Value Added”, *IMF Working Paper*, WP/17/178, 2017, pp.1-25; 吕越、毛诗丝：《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其决定因素分析》，《欧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81—103页。

② 该数据库只更新到2015年。已有不少研究使用该数据库测算最终需求依赖度，如：刘重力、赵颖：《东亚区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依赖关系——基于TiVA数据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5—129页。

表 1 中德两国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例

(单位: %)

| | 2005年 | 2007年 | 2009年 | 2011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
| 中国 | 6.78 | 7.78 | 8.10 | 9.38 | 9.62 | 9.79 | 10.30 | 10.19 | 10.25 | 10.17 |
| 德国 | 11.33 | 12.06 | 11.91 | 11.37 | 11.55 | 10.95 | 10.35 | 10.40 | 10.35 | 10.38 |

数据来源: 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两国制造业在部分行业存在竞争,但同时差异化明显。制造业是中德两国核心产业和增加值主要来源。中国出口增加值的优势产业是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设备以及纺织品行业,2005年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设备出口增加值为1928.59亿美元,纺织品出口增加值为1313.82亿美元。德国的出口增加值主要集中在自身的优势产业交通设备、化工产品、机械设备及机电设备,2005年德国交通设备的出口增加值达到1787.27亿欧元,是中国的10倍。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及电气设备以及纺织品行业实现了出口增加值的大幅增长,2017年分别达到5826.9亿美元和3296.13亿美元(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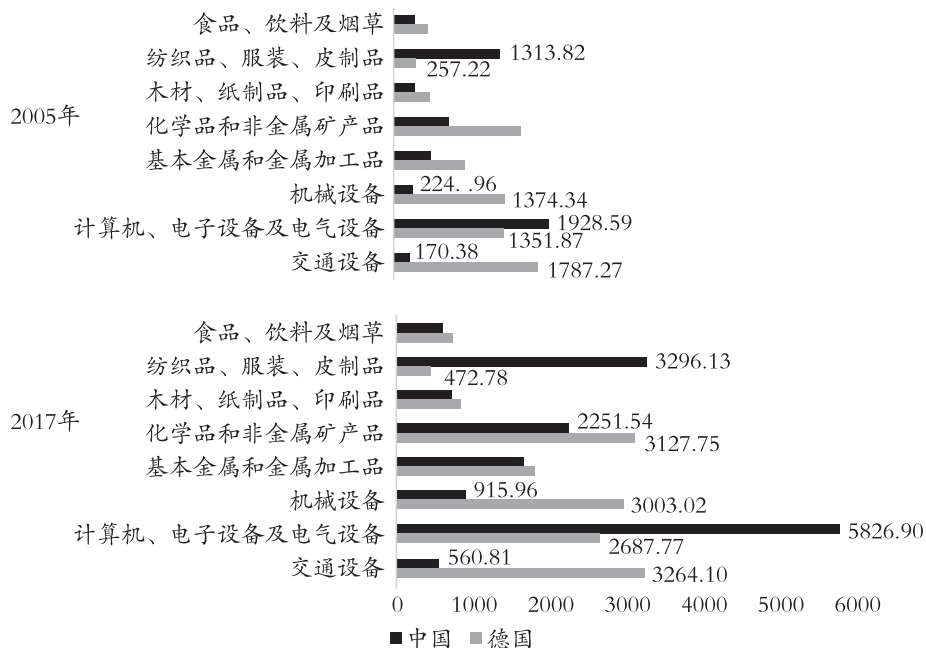


图 3 中德主要制造业出口增加值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第二，中国在价值链上下游的地位均有所提高，德国增加值占比下降。价值链不仅要考虑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还需对生产流程进行分解，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中的关系。^①两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贸易上均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且两国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比重均超过中间产品增加值。中国出口增加值从2005年起增长较快，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高均超过一倍，到2015年分别达到11.47%和13.45%；而与之相比德国的比重则出现下降，二者分别为6.71%和7.74%（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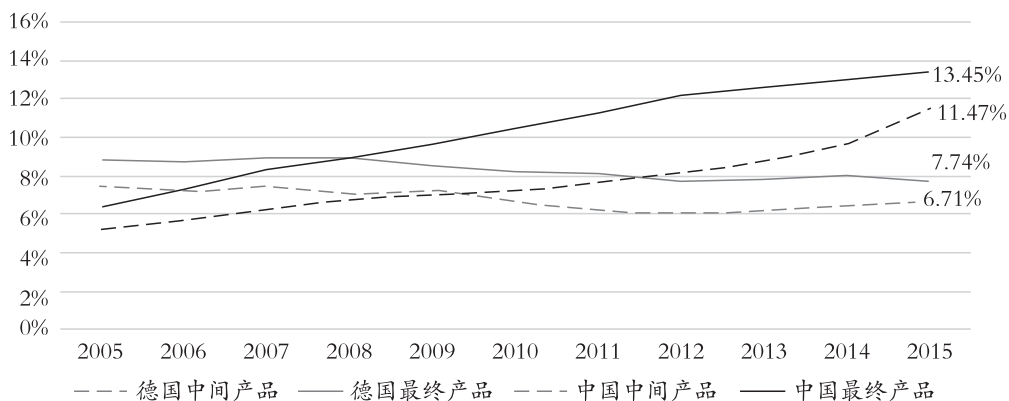


图4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增加值在全球占比

数据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中德两国制造业的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在世界占比均大于中间产品所占比重，其中中国的占比快速增长，2015年全球制造业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的18.26%和19.3%由中国创造，德国的占比则出现下降。具体细分行业中，德国的国际竞争力集中于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不过这两类产品2015年的出口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均低于2005年，只有作为中间产品的交通设备出口增加值在全球比重实现增长。而中国则在纺织品出口展现出了巨大优势，国际市场上纺织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约45%来自中国。此外在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气设备上，中国也贡献了约30%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见表2）。

^① 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5—70页。

表2 按制造业行业分出口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单位: %)

| | 中间产品 | | | | 最终产品 | | | |
|---------------------|-------|-------|-------|-------|-------|-------|-------|-------|
| | 德国 | | 中国 | | 德国 | | 中国 | |
| | 2005年 | 2015年 | 2005年 | 2015年 | 2005年 | 2015年 | 2005年 | 2015年 |
| 制造业 | 9.48 | 8.09 | 8.05 | 18.26 | 10.24 | 8.99 | 9.01 | 19.30 |
| 其中: | | | | | | | | |
| 食品、饮料及烟草 | 6.94 | 5.82 | 5.15 | 7.63 | 6.57 | 5.88 | 3.96 | 6.56 |
| 纺织品、服装、皮制品 和相关产品 | 3.60 | 2.02 | 26.19 | 44.63 | 3.01 | 1.85 | 26.34 | 45.00 |
| 木材、纸制品、印刷品 | 9.67 | 7.85 | 5.21 | 12.95 | 9.67 | 7.65 | 4.33 | 13.32 |
| 化学品和非金属矿产品 | 9.37 | 7.75 | 4.92 | 12.18 | 8.48 | 7.55 | 3.29 | 8.12 |
| 基本金属和金属加工品 | 9.68 | 7.33 | 7.17 | 16.81 | 12.33 | 8.55 | 8.60 | 20.72 |
| 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 气设备 | 5.96 | 5.55 | 13.20 | 29.35 | 5.96 | 6.22 | 15.24 | 32.71 |
| 机械设备 | 15.57 | 13.08 | 7.49 | 20.01 | 16.96 | 13.80 | 5.99 | 18.56 |
| 交通设备 | 15.80 | 16.62 | 3.52 | 8.52 | 16.05 | 14.58 | 3.45 | 9.87 |

数据来源: 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总结而言,在上游领域,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快速提高,已经成长为重要的中间产品供应国和生产方;而在下游领域,德国依旧保持了“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的位置。在具体行业上,中国在纺织品和计算机、电子设备、电气设备领域的上游和下游均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德国的竞争力体现在交通设备行业,且一直领先中国。

(二) 中德在全球价值链的依赖关系

全球价值链相互依赖关系分为“上游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①上游依赖度从出口角度出发,关注生产中的联系,指的是一个国家从外国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出口,该出口产品便包含了上游国家创造的国外增加值,由此产生下游生产者对上游供应方的上游依赖关系。一国出口增加值中来自另一国家的比重越高,前者对后者的

^① 段小梅:《两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依赖关系——基于 TiVA 数据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第93—105页; Lisandra Flach, Rahel Aichele und Martin Braml, “Status quo und Zukunft globaler Lieferketten”(《全球供应链的现状和未来》), *Ifo Schnelldienst*, No.5, 2020, p.16。

上游依赖关系越强。^①最终需求依赖则从最终需求视角出发,通过衡量本国最终需求中他国创造的增加值,计算一国最终需求对外的依赖程度。如果一国最终需求中包含的他国创造的增加值越高,则对其最终需求依赖越大。^②

1. 德国对中国的依赖

第一,中国成为德国价值链上游最依赖的境外国家。通过分解德国出口增加值的来源地可以发现各国作为供应商(提供原材料或中间品)在德国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2019年德国约62.13%的出口增加值来自德国国内,这一比例比2005年略有下降。在主要增加值来源中,德国上游对中国依赖度从2005年的1.85%上升到2019年的4.45%(见表3),中国成为德国出口增加值的第一大境外来源国,高于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见图5)。不过,从区域看德国上游最依赖的供应伙伴是欧盟,德国对欧盟成员国的上游依赖度超过17%,其中对东欧国家的依赖度逐年上升,2019年已经达到3.59%,德国对法国和意大利的依赖度也保持在2%以上。

表3 德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对上游的依赖度

(单位:%)

| | 2005年 | 2007年 | 2009年 | 2011年 | 2013年 | 2015年 | 2017年 | 2019年 |
|-----------|-------|-------|-------|-------|-------|-------|-------|-------|
| 德国 | 65.92 | 64.35 | 64.05 | 63.10 | 63.60 | 63.99 | 62.83 | 62.13 |
| 美国 | 2.99 | 2.87 | 2.88 | 2.74 | 2.68 | 2.74 | 2.76 | 2.81 |
| 中国 | 1.85 | 2.36 | 2.56 | 3.00 | 3.08 | 3.79 | 4.06 | 4.45 |
| 法国 | 3.07 | 2.98 | 2.93 | 2.85 | 2.85 | 2.64 | 2.57 | 2.56 |
| 英国 | 2.15 | 2.23 | 2.08 | 2.04 | 2.01 | 2.15 | 1.90 | 1.89 |
| 意大利 | 2.38 | 2.51 | 2.42 | 2.37 | 2.38 | 2.06 | 2.28 | 2.22 |
| 荷兰 | 1.94 | 1.99 | 2.03 | 1.97 | 1.97 | 1.92 | 1.93 | 1.95 |
| 除德国外的欧盟国家 | 18.41 | 19.00 | 18.86 | 18.50 | 18.47 | 17.68 | 17.76 | 17.86 |
| 欧盟东部13国 | 3.19 | 3.47 | 3.55 | 3.52 | 3.51 | 3.45 | 3.45 | 3.59 |

数据来源: 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① 表示为: $C_{ijk}=FV_{ijk}/EX_{ik}$, 其中 C_{ijk} 代表 i 国 k 产业对 j 国的上游依赖度, FV_{ijk} 指 i 国 k 产业出口中来自 j 国的增加值, EX_{ik} 是 i 国 k 产业出口增加值总量。

② 表示为: $F_{ijk}=FDV_{ijk}/DV_{ik}$, 其中 F_{ijk} 代表 i 国 k 产业对 j 国的最终需求依赖度, FDV_{ijk} 指 i 国 k 产业最终需求中来自 j 国的增加值, DV_{ik} 是 i 国 k 产业最终需求的增加值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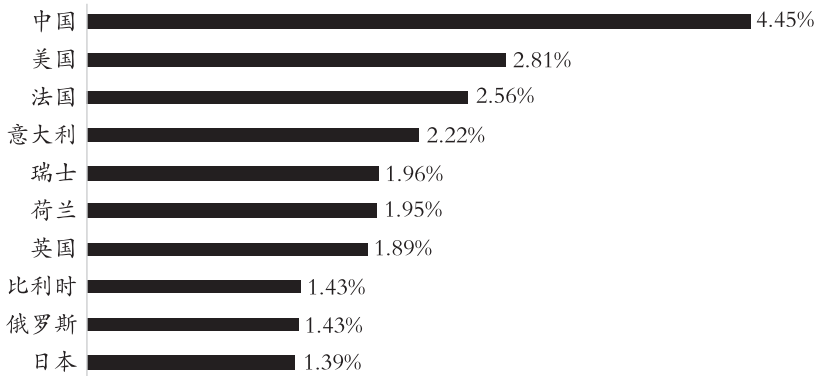


图 5 2019 年德国上游依赖度最高的国家 (地区)

数据来源: 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第二, 中国上升为德国最终需求增加值的第二大境外来源国。与上游依赖度相似, 德国自身创造的最终需求增加值占比逐年下降, 美国和中国的占比上升 (见表 4), 其中中国的重要性提升最快, 到 2015 年已经超越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成为德国最终需求第二依赖的海外经济体。欧盟的占比一直保持在 11% ~ 12%, 对德国市场增加值贡献率最高, 同时德国对东欧国家的最终需求依赖度提高了 0.62%。德国价值链对欧盟的高依赖度反映了欧盟市场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

表 4 德国最终需求依赖度

(单位: %)

| | 2005 年 | 2006 年 | 2007 年 | 2008 年 | 2009 年 | 2010 年 |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 | 2015 年 |
|------------------|--------|--------|--------|--------|--------|--------|--------|--------|--------|--------|--------|
| 德国 | 78.95 | 77.44 | 77.27 | 76.36 | 78.70 | 76.00 | 74.82 | 75.07 | 75.30 | 75.53 | 75.54 |
| 美国 | 1.94 | 2.12 | 2.02 | 1.96 | 1.85 | 2.07 | 2.11 | 2.26 | 2.26 | 2.20 | 2.53 |
| 中国 | 0.63 | 0.81 | 0.98 | 1.26 | 1.20 | 1.68 | 1.76 | 1.74 | 1.67 | 1.84 | 1.96 |
| 法国 | 1.70 | 1.68 | 1.71 | 1.68 | 1.51 | 1.67 | 1.65 | 1.59 | 1.65 | 1.70 | 1.63 |
| 英国 | 1.58 | 1.71 | 1.61 | 1.43 | 1.39 | 1.59 | 1.70 | 1.46 | 1.52 | 1.53 | 1.51 |
| 意大利 | 1.38 | 1.39 | 1.39 | 1.30 | 1.17 | 1.21 | 1.24 | 1.22 | 1.22 | 1.24 | 1.18 |
| 荷兰 | 1.11 | 1.25 | 1.11 | 1.13 | 1.22 | 1.21 | 1.14 | 1.18 | 1.29 | 1.20 | 1.15 |
| 除德国外的 欧盟 27 国 | 11.45 | 11.87 | 11.78 | 11.61 | 11.06 | 11.63 | 11.84 | 11.47 | 11.84 | 11.89 | 11.81 |
| 欧盟东部 13 国 | 1.77 | 1.91 | 2.00 | 2.10 | 1.98 | 2.08 | 2.19 | 2.19 | 2.26 | 2.34 | 2.39 |

数据来源: 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第三,制造业之中,德国纺织品和机电产品的最终需求对中国高度依赖。近年来德国对中国制造业上游依赖程度提高较快(表5),其中依赖度最高的是纺织业(6.62%)、计算机电子设备(4.6%)和交通设备(3.63%)。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在制造业上游供应方面的实力得到了增强,在德国制造业出口价值链上的地位提高。德国最终需求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同样很高,其中纺织产品和计算机电子设备的增加值占比更是高达23.25%和16.61%(表6)。

表5 德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上游依赖度

(单位:%)

| | 2005年 | 2015年 | 2017年 |
|-----------------|-------|-------|-------|
| 食品、饮料及烟草 | 0.99 | 1.73 | 2.30 |
| 纺织品、服装、皮制品和相关产品 | 3.34 | 6.74 | 6.62 |
| 木材、纸制品、印刷品 | 0.80 | 1.69 | 2.25 |
| 化学品和非金属矿产品 | 1.37 | 2.86 | 3.10 |
| 基本金属和金属加工品 | 1.26 | 2.78 | 3.02 |
| 机器设备 | 1.31 | 2.61 | 2.98 |
| 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气设备 | 2.21 | 4.42 | 4.60 |
| 交通设备 | 1.46 | 2.93 | 3.63 |

数据来源: 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表6 德国制造业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度

(单位:%)

| | 2005年 | 2015年 |
|-----------------|-------|-------|
| 食品、饮料及烟草 | 0.77 | 1.85 |
| 纺织品、服装、皮制品和相关产品 | 8.16 | 23.25 |
| 木材、纸制品、印刷品 | 1.12 | 3.04 |
| 化学品和非金属矿产品 | 0.92 | 2.55 |
| 基本金属和金属加工品 | 1.34 | 3.90 |
| 机器设备 | 1.65 | 5.20 |
| 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气设备 | 3.64 | 16.61 |
| 交通设备 | 1.19 | 2.92 |

数据来源: 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2. 中国对德国的依赖

第一,中国对德国上游依赖度下降。德国占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

1.21% 下降到 2019 年的 1.05%（见表 7）。不过在欧盟国家中，德国依旧是中国上游依赖度最高的国家，远超排在第二的法国。中国在价值链上游依赖度最高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2019 年依赖度达到 2.06% 和 1.43%（见图 6）。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处在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大陆依靠“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承接日韩等经济体的初级加工制造业，吸引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大量直接投资实现经济腾飞。如今尽管部分产业已经实现了价值链上的攀升，但是中国不少高端制造业依旧需要日韩等经济体上游高科技产品的供应，这也证实了亚洲以中日韩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网络。从国家联盟看，中国对欧盟的上游依赖度尽管持续下降，但依旧高达 3.24%。此外，东盟也成为中国企业重要的上游供应商，2019 年依赖度为 1.62%。总体上，中国在价值链上游的对外依赖度下降，而中国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则快速增长，中国在价值链上游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均有较大程度提高。

表 7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对上游的依赖度

(单位：%)

| | 2005 年 | 2007 年 | 2009 年 | 2011 年 | 2013 年 | 2015 年 | 2017 年 | 2019 年 |
|-----------|--------|--------|--------|--------|--------|--------|--------|--------|
| 中国 | 82.28 | 81.41 | 84.67 | 81.30 | 83.25 | 86.18 | 85.59 | 86.56 |
| 韩国 | 1.88 | 1.91 | 1.43 | 1.76 | 1.66 | 1.53 | 1.53 | 1.43 |
| 美国 | 1.87 | 1.82 | 1.52 | 1.73 | 1.56 | 1.34 | 1.25 | 1.18 |
| 日本 | 3.77 | 3.25 | 2.62 | 3.18 | 2.56 | 1.85 | 2.27 | 2.06 |
| 德国 | 1.21 | 1.43 | 1.18 | 1.42 | 1.31 | 0.92 | 1.16 | 1.05 |
| 法国 | 0.65 | 0.69 | 0.57 | 0.66 | 0.61 | 0.46 | 0.49 | 0.45 |
| 东盟 | 1.59 | 1.91 | 1.63 | 2.08 | 1.90 | 1.60 | 1.65 | 1.62 |
| 欧盟 | 4.13 | 4.68 | 3.82 | 4.50 | 4.16 | 3.18 | 3.53 | 3.24 |
| 欧盟东部 13 国 | 0.16 | 0.20 | 0.17 | 0.20 | 0.19 | 0.15 | 0.17 | 0.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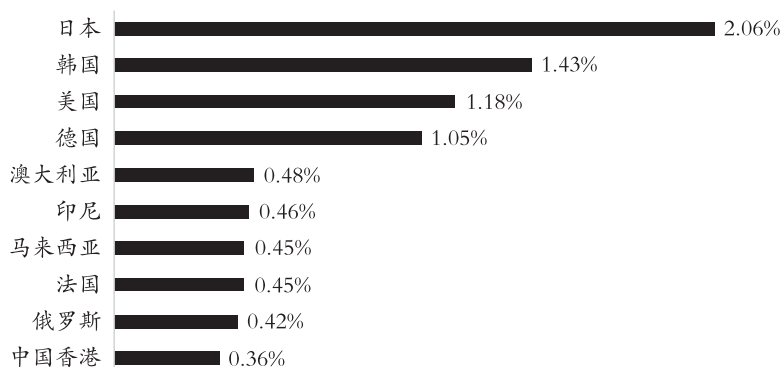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图 6 2019 年中国大陆上游依赖度最高的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第二，中国对德国最终需求依赖度下降。不过德国仍是中国最终需求增加值最大的欧洲来源地（如表8）。在境外来源地中，2012年以来，美国是最重要需求贡献国，日本和韩国次之。在国家联盟中，欧盟和东盟是最终需求增加值的主要来源方，东欧13国的占比有所上升。此外，中国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占比在2005年~2015年大幅提升，85%以上的最终需求由中国国内增加值创造。

表8 中国最终需求依赖度

(单位：%)

| | 2005年 | 2006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
| 中国 | 80.09 | 80.53 | 81.54 | 82.06 | 84.80 | 82.94 | 81.81 | 82.96 | 83.56 | 83.55 | 85.81 |
| 韩国 | 1.65 | 1.51 | 1.39 | 1.12 | 1.07 | 1.13 | 1.10 | 1.04 | 1.09 | 1.09 | 1.02 |
| 美国 | 2.25 | 2.26 | 2.07 | 1.94 | 1.71 | 1.90 | 1.93 | 1.94 | 1.98 | 2.10 | 2.12 |
| 日本 | 3.34 | 3.05 | 2.73 | 2.50 | 2.01 | 2.29 | 2.09 | 1.72 | 1.41 | 1.46 | 1.27 |
| 德国 | 1.14 | 1.18 | 1.13 | 1.12 | 0.97 | 1.05 | 1.12 | 1.02 | 0.98 | 1.06 | 0.87 |
| 法国 | 0.50 | 0.48 | 0.44 | 0.45 | 0.34 | 0.35 | 0.37 | 0.37 | 0.35 | 0.38 | 0.34 |
| 欧盟28国 | 3.48 | 3.41 | 3.28 | 3.22 | 2.70 | 2.85 | 3.07 | 2.85 | 2.76 | 2.99 | 2.57 |
| 东盟 | 1.47 | 1.55 | 1.51 | 1.40 | 1.28 | 1.49 | 1.60 | 1.43 | 1.40 | 1.35 | 1.25 |
| 欧盟东部 13国 | 0.14 | 0.15 | 0.16 | 0.17 | 0.15 | 0.17 | 0.20 | 0.19 | 0.19 | 0.21 | 0.18 |

数据来源：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第三，制造业中，中国在交通设备、机械设备和机电产品对德国上游和最终需求依赖较高。这三个产业均是德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不过中国制造业对以上三大产业上游依赖度均出现下降，只有最终需求上对德国的计算机、电子设备和电气设备以及交通设备依赖度有所提高，其中最终需求对德国最为依赖的是交通设备，2015年达到3.69%（见表9和表10）。

表9 中国制造业对德国的上游依赖度

(单位：%)

| | 2005年 | 2015年 | 2017年 |
|-----------------|-------|-------|-------|
| 食品、饮料及烟草 | 0.59 | 0.46 | 0.59 |
| 纺织品、服装、皮制品和相关产品 | 0.82 | 0.62 | 0.79 |
| 木材、纸制品、印刷品 | 1.28 | 0.92 | 1.15 |
| 化学品和非金属矿产品 | 1.17 | 0.86 | 1.09 |

(待续)

(续表)

| | 2005 年 | 2015 年 | 2017 年 |
|---------------|--------|--------|--------|
| 基本金属和金属加工品 | 1.17 | 0.85 | 1.06 |
| 机械设备 | 1.75 | 1.28 | 1.58 |
| 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气设备 | 1.85 | 1.392 | 1.768 |
| 交通设备 | 1.93 | 1.387 | 1.766 |

数据来源: 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orldmrio.com/unctadgvc/>。

表 10 中国制造业对德国的最终需求依赖度

(单位: %)

| | 2005 年 | 2015 年 |
|-----------------|--------|--------|
| 食品、饮料及烟草 | 0.34 | 0.35 |
| 纺织品、服装、皮制品和相关产品 | 0.62 | 0.42 |
| 木材、纸制品、印刷品 | 1.38 | 0.92 |
| 化学品和非金属矿产品 | 1.23 | 1.23 |
| 基本金属和金属加工品 | 1.92 | 1.10 |
| 机械设备 | 4.91 | 2.60 |
| 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电气设备 | 1.78 | 1.85 |
| 交通设备 | 3.23 | 3.69 |

数据来源: OECD TiVA (Trade in Value Added), <https://stats.oecd.org/>。

综上所述,中国与德国均是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是全球贸易增加值的主要贡献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快速提升,计算机、电子设备及纺织业表现尤为强劲。而德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虽然增幅小于中国,但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增加值来源国,在交通设备、机械设备、化工领域保持全球主要供应方和生产者的地位。在产业关联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不断向微笑曲线高附加值部分攀升,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上游产品供应方,同时保持对全球终端市场增加值的高贡献率。而德国则维持在全球价值链的优势地位,是重要的产业链资源整合者。

中德依赖关系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德国依旧是全球贸易强国,中国发展迅速但与德国相比仍存在差距。

德国一直保持世界最大出口增加值来源国的地位,中国创造的出口增加值迅速增加,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全球第二大出口增加值来源国。中国尤其在计算机、电子设备

和电气设备方面体现出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德国在交通设备领域创造的增加值大幅领先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2018年中国出口额超出德国近1万亿美元，^①但出口增加值仍低于德国。德国用8%的全球出口额创造了10.38%的增加值，而中国创造的10.17%增加值则来自于全球12.8%的出口额。^②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工业制造业仍保持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部分，中国整体上与制造业“大而强”的目标存在差距，增加值的创造效率仍低于德国。

(2) 德国对外依赖度持续提高，中国的价值链独立性持续增强。

德国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其上游出口增加值中来自外国的比例从2005年的34.08%提高到2019年的37.87%，最终需求增加值中来自外国的比例则从2005年的21.05%上升到2015年的24.46%，这与德国出口情况一致：德国货物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的34.4%提高到2019年的36.2%。^③与之相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独立性逐步增强，上游对外依赖度从2005年的17.72%下降到2019年的13.44%，最终需求依赖度则从2005年的19.91%下降到2015年的14.19%。这一趋势与中国近年来逐步降低对外依赖的走势相统一：2005年到2019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从33.44%下降到17.47%，降幅将近一半。^④

(3) 德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增加，但不存在对中国单一市场的高度依赖。

德国对中国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价值链上游，中国企业通过加入德国企业上游供应体系成功融入德国企业的产业链网络中，成为德国重要的中间产品供应方，这也是众多中国制造业企业从中国市场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同时也不应夸大德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德国对美法意的上游依赖度一直保持在2%以上。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增加值外国来源地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达到近18%。而在最终需求依赖度方面，德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低于对美国的依赖，更是远低于对欧盟的依赖，并且德国企业在中国产业下游和消费市场仍占据优势位置。因此德国所忧虑的对中国过度依赖并不符合事实，德国全球价值链真正高度依赖的是欧盟。

① BMWi, “Fakten zum deutschen Außenhandel” (《德国外贸信息》), BMWi-Öffentlichkeitsarbeit, 2019, p.3.

② 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 <https://www.wrldmrio.com/unctadgve/>.

③ Statista, “Exportquote nach dem Außenhandelskonzept in Deutschland von 1991 bis 2020” (《1991年—2020年德国外贸出口比率》), March 2021, <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419867/umfrage/exportquote-nach-dem-aussenhandelskonzept-in-deutschland/>.

④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

三、中德全球价值链依赖关系变化的影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塑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要求，“十四五”规划提出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与此同时，随着“后默克尔时代”的到来，中德关系面临调整。德国社会的“疑华”情绪^①及以德国政府降低对华依赖手段为中德价值链合作带来了不确定性。相互依赖理论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理解国与国关系的关键。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指出，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将影响国内政治决策，各国在制定政策和选择政治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决策。同时国际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日益壮大，直接参与世界政治甚至在特定领域与主权国家形成博弈。^②相互依赖理论侧重从商品服务流通、货币等宏观视角描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全球价值链将中间产品增加值纳入框架范围，深入经济关系内部寻找相互依赖关系的底层逻辑，为相互依赖理论提供了较好的补充，在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更加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德全球价值链依赖关系变化的分析，可以将其对中德经贸关系的影响总结如下：

（一）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增加值创造国，但中德经贸关系仍以互补性为主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攀升，按照当前增长趋势，中国出口增加值总量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增加值创造国。但是德国在交通设备和机械设备领域将依旧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并仍然是上下游重要的供应方。在一定时期内，这两个行业内将依旧保持中国生产中端产品、德国专注高端市场的格局。由于两国在制造业领域产业依存度高，中德将更多地呈现优势互补基础上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局面。因此尽管中德经贸的竞争性有所提升，但互补性仍是主导，总体上合作大于竞争。

^① 寇蔻、李莉文：《德国的外资安全审查与中企在德并购面临的新挑战》，《国际论坛》2019年第6期，第96—111页。于芳：《国际信任视角下德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分析》，《国际论坛》2020年第2期，第138页。

^② Richard Coop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ies,” *World Politics*, Vol.24, No.2, 1972, pp.159-181.

（二）中德之间无法完全“脱钩”，经贸依赖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

德国对中国价值链的依赖度快速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德国重要的增加值来源地。由于中国供应体系和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德国在纺织品和计算机电子设备等行业很难完全脱离中国的产品和生产网络。两国价值链的依赖是相互的，中国依赖德国的汽车和机械设备供应，德国是累计中国依赖度最高的欧洲经贸伙伴。两国企业直接投资往来同样频繁，德国是在华直接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也是中国第二大欧洲投资目的地。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重要性持续增加，德国对华投资占德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1.28%上升到2018年的2.05%；中国企业投资占德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比重从2011年的0.24%已经攀升到2018年的1.46%。^① 201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新一轮开放政策吸引宝马、安联、巴斯夫等德国企业追加在华投资，中国率先复产复工也为德国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巨大机遇。2020年中国超过法国，成为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受疫情影响，德国与几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均出现下降，但2020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却逆势上涨3%。^② 因此完全脱离中国供应商和市场对于德企而言是不现实的选择。另外，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构建“双循环”的经济新发展格局，包括德国在内的不少国外观察家和企业担心中国经济的国际依赖会减少，会更多地强调“经济自主”，减少国际合作。^③ 本文的分析表明双向依赖仍然是主流。

（三）德国在印太的产业链分散化策略效果有限，但不同行业将出现分化

尽管跨国企业互动牵制了主权国家的决策，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轻易放弃国家主权，或任由跨国商业过度影响本国政治决策，主权国家会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借助政策工具对本国或他国的跨国企业决策施加影响。德国政府通过《印太指导方针》和国家补贴等形式谋求企业跨国经济合作多元化，避免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东南亚和

① 中国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http://wzs.mofcom.gov.cn/article/ztxx/>；UNCTAD数据库，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sCS_ChosenLang=en。

② 德国联邦统计局，“China 2020 im fünften Jahr in Folge Deutschlands wichtigster Handelspartner”（2020年中国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February 2021，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lungen/2021/02/PD21_077_51.html。

③ 中国欧盟商会，《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1/2022》，September 2021，https://www.european-chamber.com.cn/en/publications-archive/964/European_Business_in_China_Position_Paper_2021_2022。

中东欧被在华德企视为供应链分散化布局的主要替代地。^①部分对中国市场依赖度较低的行业可能被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或被分散至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同时德国可能会采取价值链重组措施减少公共安全相关领域（如卫生用品和制药原材料）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德国经济最为倚重的交通设备、机械制造等产业将继续保持并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德两国在相关产业都有大量企业参与供应链合作，在这些行业有较高的市场依存度。不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今后两国企业在这些行业的竞争也将会加剧。

经济依赖关系不仅塑造了国际贸易结构，而且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吉尔平认为，相互依赖存在一种“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即非对称性相互依赖。^②非对称的依赖关系被视为不稳定的关系，依赖程度高的一方处于弱势地位，依赖程度小的一方则将相互依赖视为权力来源，^③经济上依赖度的提高将增加该国的脆弱性。^④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产业结构与德国加速趋同，中德之间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有所缓解。而按照现实主义逻辑，相互依赖不仅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权力资源，同时更能削弱另一个国家的权力基础，增加担忧甚至恐惧心理，因而出现尝试打破相互依赖的状态。^⑤随着德国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提高，中德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性增加。德国新对华政策强调双方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经贸领域展开合作的同时冀图用规范、规则和制度约束中国；^⑥通过《印太指导方针》扩大欧洲和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减少对中国依赖；借助《供应链法》将欧洲价值观念融入企业经营行为，增加在全球供应链规则塑造过程中的话语权。经贸关系作为中德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有所减弱。但是相互依赖出现的前提不仅是一方能够供给另一方所依赖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交往产生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

① 中国德国商会，“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20/2021,” <https://china.ahk.de/market-info/economic-data-surveys/business-confidence-survey>

②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页，转引自：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③ 李孝天：《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启示与前景》，《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4页。

④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

⑤ 方长平：《国际冲突的理论与实践》，2018年8月17日，<https://www.pishu.cn/pssjkw/523959.shtml>。

⑥ 熊炜：《德国对华政策转变与默克尔的“外交遗产”》，《欧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15页。

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视角看，中德之间早已不是简单的消费市场和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已互为对方重要的供应方、生产商和消费市场，在价值链上高度融合。中德之间的依赖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逐渐趋于对称平衡的。相互依赖的深化不单是程度的变化，还是众多环节上的进一步交织，这种深层次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构建了两国间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网络，任何企图破坏这种依赖关系的做法都可能给两国的生产、消费以及社会福利带来高额成本。因此经贸合作依然是中德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德国政治上采取对华不信任的现状下，维护经贸关系对于中德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带来合作空间。后疫情时代跨国企业将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缩短过长、过复杂的供应链，以靠近消费市场为优先，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因而对德国企业依旧具有巨大吸引力。对中国而言，应首先认清本国的发展阶段，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提升的同时，与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效率和制造业发展水平上仍存在差距。中国应坚持以我为主，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政策红利，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和产业转型。除了气候变化、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中德在传统制造业升级方面仍然拥有巨大合作空间，未来应进一步围绕价值链高附加值部分与德国展开创新合作，利用市场、供应链和人才储备优势增加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做大做实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收稿日期：2021-07-12】

【责任编辑：何宗强】

and Covid-19 has made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ly alarmed by the strategic threats posed by China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US has moved to secure its geo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Different from the soft balancing approach adopted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dopted limited hard balancing against China to counter the perceived strategic threats and maintain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there by building an alliance network for limited hard balancing, and conducting military activities. There are signs that this policy will be continued in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prevent the US from shifting from limited hard balancing to complete hard balancing in the region, and to preserve China's achievements there, China should slow down or reduce its footprint so as not to worsen the strategic concerns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Key Words】 limited hard balancing, China-US relations,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49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y Kou Kou & Shi Shiwei

【Abstract】 As important trade partners, China and Germany are key countri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However, due to the shock COVID-19 has brought to GVCs, there is now more uncertainty in Sino-Germ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t is found that China has rapidly improved its position in GVCs, becoming the second largest source of value added in exports after Germany. Meanwhile,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a's value chain continues to rise, while Germany's dependence on China is increasing in both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arts of GVCs. Out of economic security concerns, German companies have attempted to diversify the supply chains or relocate their industries in China that are noncompetitive to other economies. But this has not changed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the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hip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decouple" given the high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ir core manufacturing sectors. The stabilizing rol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is now being limited due to non-economic factors as the German government emphasizes values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s, and views China as a systemic competitor. But this will not have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thanks to their more balanc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s this interdependence continues to grow in depth and scope, economic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will keep expanding,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remains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a-Germany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a–Germany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global value chains, value-added in exports,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a–Germany relations

69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to Entry in the UK and China–UK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Case Studies of 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Corporation and Huawei** *by Ma Shuang*

【Abstract】 Since entering the “golden era” of China–UK relations,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s deepened.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political risks facing Chinese companies have increased in the UK as it has frequently interfered in Chinese internal affairs, imposed unilateral sanctions, and repeatedly set up barriers in market access under the pretext of national security. Although China–UK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s affected by the UK’s increasing perception of Chinese threat,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the impact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ese companies also have the initiative to adjust to th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 analysis of the cases of 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Corporation (CGN) and Huawei shows that the UK’s barriers reflect its twin considerations of security risks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n foreign investment. The fluctua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has a more obvious impact on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threat, while the level of economic benefits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the compan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olden era,” CGN successfully overcame the entry barrier and invested in the UK nuclear power market by virtue of its technological and financial advantages. Recently, the change in British 5G policy on Huawei from “limited access” to “complete ban” is due to the UK toughening its economic policy following a drop in China–UK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to the reduced bargaining power by Huawei hit hard by a new round of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S. In view of the recent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hinese companies should focus on the domestic part of the “twin circulations” and exercise caution in “going out” to guard against loss in overseas investments due to political risks.

【Key Words】 European diplomacy, China–UK relations, overseas investmen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China–Europe relations

87 **The Tightening of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on Foreign Investment by the UK, France and Germany** *by Hu Zinan*

【Abstract】 Since 2020, the UK,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revised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o protect domestic competitive industries